

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

邱海平 孟捷 周建波 杨虎涛 张旭

编者按：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会议尤其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和理论维度。为此，2022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以“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为主题，约请邱海平教授、孟捷教授、周建波教授和杨虎涛教授四位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就中外各思想流派对资本的定义以及经济思想史上对资本认识的变化、如何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等问题展开对话交流。会谈由张旭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作者简介]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haipingqiu@sohu.com；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mengjie_fdu@fudan.edu.cn；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zhoujianbo@pku.edu.cn；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86288256@qq.com；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zhangxuphd@vip.163.com。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九讲“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实况记录，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秦蒙整理。

张旭教授（主持人）：此次学术活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的第二十九讲，主题是“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以往我们论坛每次由一位主讲人、两到三位评议人来完成讲座，今天我们创新了一下做法，采用了一种学术沙龙主题讨论的方式。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四位与谈人。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邱海平教授，他同时担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第二位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孟捷教授，他同时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第三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建波教授，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第四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杨虎涛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旭，同时担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的秘书长。

我先对此次会谈主题简要作一个说明。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以，现在“资本”问题成为一个学术界和实践界的热点话题，如何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学术沙龙式的讲座，请经济思想史方面四位知名学者就“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这一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研讨会重点讨论以下三个方面：（1）中外各思想流派对资本的定义以及经济思想史上对资本认识的变化；（2）中外各种经济学流派对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的认识；（3）如何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以及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关系。先请各位与谈嘉宾根据自身学术背景和学术特长，来谈一下中外各种经济学流派对资本概念的认识以及经济思想史上对资本认识的变化。邱海平教授和孟捷教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学说

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展开阐述，周建波教授可以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角度探讨，杨虎涛教授可以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具体展开。首先请邱海平教授发表高见。

各经济思想流派对资本的定义以及经济思想史上 对资本认识的变化

邱海平教授：前几天收到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强调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讨论资本问题，我想把我关于这一问题所做的几点思考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和交流。虽然今天参加对话交流的学者都有各自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背景，虽然我们今天是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认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的实践，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个维度密不可分。今天我们提出资本问题本身就带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性质，因此不能简单地从一个纯学术的视角来介绍每一个流派或者某些经济学家提出怎样的资本理论来讨论资本问题，更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背景来讨论资本问题。因此，资本问题既是理论的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讨论资本问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一个立足点。

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实践问题，一定会延伸到思想史，包括经济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界主流的看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大体上是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来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因而也是正确的。而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它是非科学的，所以也是错误的。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也就认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那个时代在实践上也是排斥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因此，在概念话语上，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是资金，而不叫资本。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概念随之在中国就恢复了，而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资本形态，包括私营资本、混合资本、国有资本等。于是，随着实践本身的发展，中央文件里也开始使用私营经济以及资本等一些概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央文件往往是在要素的含义上

使用资本的。例如从党的十五大一直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把资本理解为一个要素，从来没有明确说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第一次正式的破题，这十分重要。一旦涉及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就不再只是在要素的含义上来讲资本了，这也反映了中央对于资本在认识上的重要深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数字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这一新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现象，中央文件里将此概括为“资本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这也说明资本在我们国家现实经济发展当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消极影响，从而对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是重要的现实背景。

中国实践的发展再次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严肃且重大的理论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资本以及如何理解资本。我们刚才说了中央文件对资本使用的含义是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梳理以前的资本理论，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话很重要的意义所在，就是说我们要回答什么是资本。这需要我们去了解中外学术界、理论界对资本有哪些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可能各种流派对资本的解释都不相同，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两派，一派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再一派是从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理论。这两派的理论我简单概括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侧重讲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从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更多把资本理解为一个要素。如何进一步认识这两种资本理论及其关系，可能就是今天我们基于中国的发展实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只有在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两种主要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以及它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觉得需要深入理解这两种理论的实质关系。在我看来，把资本作为要素和把资本作为生产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物质财富生产与价值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从物质财富生产的角度来讲，各种非劳动要素才会发生作用；而在价值财富生产问题上，只有劳动是价值唯一的实体、唯一的来源，其他的只是条件。更进一步，物质财富生产与价值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延伸到使用价值和价值

生产关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从现在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理论视阈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是更复杂的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和价值财富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背景下，这个问题值得重新去回答，且现有所有的理论都没有能够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不再谈价值，而是用均衡价格代替了价值，这直接回避了问题。而出于对生产关系的关注，马克思虽然也分析了使用价值的问题，但是他的侧重点仍然在于分析价值和剩余价值问题，究竟如何在理论上完整解释生产的物质要素和劳动在使用价值及价值生产当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各种生产要素和劳动这个独特的要素在使用价值及价值创造当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是从经济思想史梳理的角度涉及这样复杂的理论问题。我就先说这么多，抛砖引玉。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邱老师。我们接下来请孟捷教授阐述他的观点。

孟捷教授：主持人好，刚才听了海平教授的发言很受启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又可以被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表现、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另一个是它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包括政策-制度话语、学术-理论话语，也接受了资本这样的概念。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抱并接受资本概念的呢？我认为从党的十六大才开始接受资本概念的，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话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资本概念的接受并不彻底，这尤其表现在政策-制度话语中：当我们在政策-制度话语中接纳资本概念时，强调了表现和适应生产力的方面，比如我们会谈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样的问题，但是却不怎么谈论剩余价值概念。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更好地理解资本概念呢？我认为需要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读过我文章的一些朋友可能知道我最近几年一直倡导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任务的完成需要构建三个理论：第一，构建一个参照系理论，这需要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第二，以参照系理论为前提，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第三，从市场失灵理论中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资本概念的两个方面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地方。（1）它出现在参照系理论里，参照系理论中的资本概念实际上讲的是资本表现、适应生产力的这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的表现和适应生产力的这个方面，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相对生产价值理论的阐述。（2）资本概念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市场失灵理论里，这里的资本则表现为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阐述的，“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这也对应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方面。（3）当资本表现为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时，需要驾驭资本，而对资本的驾驭是通过国家经济治理实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我们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中对资本概念的强调重心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召开党的十六大的时候还是市场经济形成之初，强调资本概念表现和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于是我们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更高的阶段，一些大资本片面谋求自身利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强调所谓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平台资本垄断问题，这样也就给国家经济治理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驾驭资本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讲到这里。

张旭教授（主持人）：接着有请周建波教授，能不能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给我们扩展一下。

周建波教授：谢谢主持人。在我看来，外国经济思想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所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就目前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从理论构建视角分析资本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别构建了不同的资本理论。中国经济思想史则更多从实证角度论述资本问题，偏重于对资本问题来龙去脉的了解，史料丰富，如具体分析资本运动带来的优点和缺点、如何防范资本运动的缺点等。由这一点再进一步讨论主持人讲的关于资本的定义，可以发现：在外国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将资本定义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即资本能够带来利润；而西方主流资本理论则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讲

劳动、土地、资本，并进一步讨论在技术一定的情况下，它们怎么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实际上很少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本的好和坏，更多是基于实际运行的视角论证资本的运行及其优缺点。首先，资本的优点在于能够生出利息，也即资本能够带来新价值的价值，或者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国的思想家常用“本”来描述“资本”，用“息”来描述资本带来的新价值，认为“本能生息”，这一含义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关于资本的定义存在相同之处。其次，资本运行也存在负作用，它一方面会因为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而导致产业、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因为流动得太快而导致失业人口过多，出现流民问题而引致全社会危机的爆发。因此，从中国古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家就试图控制资本的负作用，例如古代所强调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从农业流入到工商业所带来的负作用，并希望借此政策阻止资本过多流向工商业，实现产业均衡，防止贫富分化。而在今天，我们则更多地是通过发展国有企业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实现产业间的均衡和减少贫富分化。

这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对资本的认识，简单来讲就是一方面承认资本能够带来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强调要抑制资本的负作用，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实际上，中国经济思想和外国经济思想对资本的基本概念的认知存在很多相通之处。我就讲这些，谢谢。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周老师，非常受启发。接下来请杨虎涛教授谈一下看法。

杨虎涛教授：当我们在讨论资本问题时，包括各位老师刚才所谈的关于资本的理解，主要还是基于《资本论》的。主持人问我演化经济学有没有关于资本的定义或独特的理解，这的确是有的。我们从演化经济学的源头来看，演化经济学实际上起源于两个脉系。一是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这一系，凡勃仑对于资本的理解就是资本都是无形的财富。基于这一定义，凡勃仑将资本范围扩大了很多，同时也通过这一定义分析了容易因为信用而产生波动的经济周期。另一个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一系，熊彼特认为资本这个词只应当放在金融资产上，其他的都不要讨论。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家过多地纠缠了资本的概念定义，并呼吁回到资本的金融属性。这是从演化经济学的源头上看它对资本定义的论述，这很显然与在

《资本论》中所接触的资本的定义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再说当代演化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这里需要提到当代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他在《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定义资本必须满足五个条件，即：（1）使用权可否被拥有或雇用？（2）是否有一个在这种类型资本的市场上形成的价格？（3）可否用作抵押物去借款？（4）可否在出售中把全部所有权转移给买方？（5）价值是否可以度量？按照上述标准，传统的四种关于“资本”的观念：作为货币或抵押物的资本、“资本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定义偏差。例如，货币、资本品和社会资本历史上都远早于现代资本主义，而人力资本则不具有可抵押性，等等。于是，霍奇森在凡勃仑、熊彼特定义的基础上，重新给资本下了一个定义，即资本可以被定义为投资于生产的货币，或者可让渡的、可抵押的用于生产的财产的货币价值。其中，他尤其强调可抵押性，认为正是这种可抵押性，才使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一种裂变式的发展，构成了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种理解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不平等源泉的独特视角：资本家的资产可以抵押，但劳动力不可抵押，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权利不对等和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这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在演化经济学当中怎么理解资本。

第二个问题，从经济思想史上去讨论对资本认识的变化。总结来说，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经济学界和商业界对资本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在货币含义上；在13—17世纪甚至更晚近的时间里，资本的货币含义都是题中之义，在贸易和记账背景下，资本就是预付货币、股份的含义，按照霍奇森的考证，这与复式簿记法有直接关系。就像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说的那样：复式簿记的精神，就是伽利略和牛顿系统的精神。不过，从斯密开始，资本的含义就开始扩大到生产性资料、物质资料甚至人及其劳动等“生产性资源”的含义上，由于斯密曾经将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改进视同于工具一样的固定资本，后世学者甚至将人力资本的起源追溯到斯密。从斯密这里，资本的货币含义开始淡化，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总体看，追随斯密的是大多数，比如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及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等，对资本的关注点，都在生产更多物品的物品这个层面上。不过

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松巴特等，还是坚持斯密之前的对货币价值的理解，当代社会学与经济学进一步泛化了资本的内涵，尤其是社会学，扩展出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符号资本等更多的范畴。与遵循斯密传统所不同的是，演化经济学并没有将资本的货币含义淡化，而是一再强调了资本的货币价值和金融属性。演化经济学对资本的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认识资本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特别需要重视虚拟资本无限的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张旭教授（主持人）：感谢四位老师从不同的视角对资本及其相关问题做了一个说明，很受启发。我也补充一些我的看法。接着孟捷教授的发言，可能我们对马克思有一个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影响了我们对资本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不管不同流派的学者、不同时期的学者对资本如何界定，实际上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对资本本身基本上是正面表述的。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的话语来讲，资本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技术层面的资本，它更多或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货币量的大小，或者投资额的大小，这是最直观的表现；还有一个是价值层面的资本，也就是我们说的它表现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对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资本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不仅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其他手稿中，同时也体现在《资本论》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流通过程这部分表述，马克思都提到了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伟大方面。但是，马克思同时强调，资本虽然在实际上克服一切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它本身又创造出新的障碍。马克思接着讲，资本不可遏制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我觉得，《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可以给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或者重新认识《资本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过去因为把资本对生产力的创造和推动，和它对人的自由的遏制对立起来了，实际上真正的人的自由发展也是资本的贡献之一，尽管是附带的贡献，甚至说无产阶级之所以有组织纪律性，恰恰是因为资本的锻造。所以对马克思经济学可能有很多的误解，这些误解有的来自一些简单对立的传统观念，有的来自一种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误读。我就稍微补充这么一点看法。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资本行为规律或者资本特性是

怎样认识的？对资本大概的运动规律到底怎样认识，才有利于我们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消除它的不利影响？希望大家言简意赅地论述一下，我们还是首先请邱海平老师来讲一讲。

对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的解释

邱海平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讲一个思路。讲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从辩证法角度说，就是从一般和个别或者特殊这样的视角去思考。第一个问题，资本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只讲资本本身，前面不加限制，即不考虑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这个概念肯定具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资本的逐利性。所谓行为规律，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要解释行为规律，首先需要区分资本本身的行为规律和资本家的行为规律；其次，资本的特性和资本的行为规律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我们只有先理解了资本的特性，才能进一步理解其行为规律，而对于行为规律的理解又要去考虑资本本身的行为规律和资本家、资本所有者的行为规律。

第二个问题，讲资本的特性，这需要在中国现在制度的背景下来探讨。因为从逻辑上来说，资本和国家制度以及我们社会的条件是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单线的逻辑关系。从实际上来讲，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现的资本，本身就是在我们党的理论指导下，在我们国家制度不断发展过程中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认为探讨资本特性和资本行为规律这个问题，不能把其仅仅虚置到一般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来回答。此外，对于资本本身，也不能把不同性质的资本、不同形式的资本、不同形态的资本混为一谈。比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私人资本、混合资本也不一样。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来讲，我们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一般，更重要的是要认识特殊，以至于上升到个别，只有这样，我们的认识才可能更加切合实际。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现成的结论，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思考的方式，供大家参考。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邱老师。下面听听孟老师的看法。

孟捷教授：关于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个别资本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第二方面，是资本所蕴含的各种矛盾；第三方面，政治经济学中所讲的规律是指，以个别当事人的理

性化行为为前提,无数个别当事人行为的社会综合所形成的规律,这个规律经常在当事人的背后发生作用,其有盲目性、自发性。因此我觉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更多层含义。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比如讲到资本的行为和动机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基本经济制度来看,我们有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这两种资本形式,它们在行为和动机模式上有共性,即都追求资本增殖。但是,公有资本的行为和动机模式有它自身的特殊性,非公有资本的支配性动机在于追求利润,而公有资本除了利润动机外,还要主动配合国家经济治理的需要。正是因为公有资本的这个特殊性,我们的宏观调控才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的规律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这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体系。我最近几年来一直主张,在这个规律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剩余价值规律,它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规律,这一规律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这个规律当中包含了促进、表现生产力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包含与此相背离的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尽量规避后一方面,并尽可能发挥前一个方面的作用。而且,凭借国家经济治理,我们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详细的论证大家可以看我的一些相关文章。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孟老师。下面请周老师发言。

周建波教授:听了两位老师的高论之后很受启发,我还是接着我刚才的话讲。与外国经济思想史关注的重点不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更多探讨的是资本的运动规律、资本的流动带来的优点和弱点,以及怎么来防范资本运动的缺点。资本就是为了追逐利润、追逐价值增殖的,并在运动中完成追逐,所以资本运行的特征是流动,而资本流动的规律是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比如从一个国家的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从一个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等。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全球资本以及一国国内资本的运动规律:从全球资本流动来看,近代中国一直贸易逆差,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流向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我国内部来讲,资本从农村流到了城市,并导致了20世纪20—30年代农村经济衰退。基于资本流动存在这样的规律,自然在全球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国家或地区就会发起反全球化运动;至于在一国国内,则会因为农村的破败、农民的贫穷而发生农民暴动、农民革命。因此,资本要实现长久追逐利润的目标,一定需要均衡的实现,包括产业的均衡、收入

的均衡等。因为没有产业均衡，发展不好的产业就会影响发展好的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没有收入均衡，诸如农民收入下降等会导致产品卖不出去，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均衡的实现就需要宏观经济调控发挥作用。由于资本流动规律所导致的非均衡问题用市场调节方法解决不了，只能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命令以逆流动的方式解决。比如说，通过国有资本来驾驭私人资本带来的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资本垄断，通过在农村设置农村信用社以保证农村的资金来自农民并回到农民手中等。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形式调节以实现均衡的思想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的“管桑之术”，到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包括近代的孙中山，都强调通过国有资本来消除资本无序扩张的消极影响。这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对资本运行规律的认识。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周老师。请杨老师发言。

杨虎涛教授：如果命题是资本的行为规律或者资本运动的规律，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问题，从微观动机到宏观结果，从单个资本到社会总资本，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做了很多详细分析。不过，结合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现实背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语境下讨论资本行为规律或者资本运动规律，取决于我们政策出台的特定目标、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去认识什么规律、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讨论资本的行为规律，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资本运动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增殖，完成资本积累过程。但是我们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为了价值而生产，而是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不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生产。同时我们的资本在运动中还要满足多方位的要求，比如是否维护了市场公平、是否满足区域协同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等。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下去讨论这个问题要更复杂。

结合我们当前的发展，我认为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目的，不只是一是要认识已经被经济学家、经济学教科书所揭示的那些规律，更是要认识当前所出现的一些新型的资本形态所独有的运动规律。例如平台资本，平台当中所承载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格式不一样、所承载的功能不一样，因此不同平台的资本行为规律也不一样。比如作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那些平台，和作为消费互联网那些平台是明显有差异的；直接撮合交易的平台，与产消合

一者和玩工聚合的平台是否一样？这是需要我们逐一去分析，而不是笼统地用一个平台资本就能够囊括所有的。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跨国资本的运动也有一些独特的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比如通过自身的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价值链的“无工厂制造商”，其在知识产权运作、避税、转移利润等方面的行为具有独特性，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跨国扩张所能够涵盖的。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虎涛教授和其他三位老师。事实上，抽象讨论资本行为规律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我们还是要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来讨论资本的行为规律。中国这种特殊国情如果从经济制度上来讲，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合今天讨论的话题，接下来自然就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以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和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关系，请各位老师贡献一下你们的智力成果。还是先有请邱海平老师。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行为规律的认识

邱海平教授：所谓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从我们实际的社会经济当中抽象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纯粹所谓市场经济，即使在资本主义以前那种商品生产条件下最初形态的市场经济，它也是和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跟封建制度有关联。然后再到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某种意义上讲，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来讲，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绝对的商品生产，把一切都市场化，彻底市场化，什么都能卖，劳动力也可以买卖，当然还包括人的器官，甚至良心、名誉、地位都可以交换，这就是彻底的市场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显然与之不同。其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我们今天主要对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我们更要看到问题的实质。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关系问题。公有资本的目标函数和单纯的私人资本，以及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相联合而形成的混合资本，或者是股份资本，也还不完全一样。虽然

说有共性，就是要增殖，但是国有企业的增殖行为会受到制度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国有资本在抗疫过程当中所承担的角色，哪怕会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它会服从国家的意志。而相反我们会看到私人企业，包括私人医院，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可能是唯利是图。所以我们在理论上去认识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应该还是很清楚的。

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不用讨论的，因为实践证明这是原则。我们一方面要利用资本这种形式，无论是实现我们国有资产的增殖还是非公有资本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等；另一方面同时要注意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这就要求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政策体制的健全来对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进行正确规范、引导和驾驭。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邱老师，谈得非常好。这里涉及一个很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画等号的，它们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尤其现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所有权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而已，实质上如果公有制已经没有了绝对的量的优势，单纯靠一种行政的强制力，能不能对抗资本的无序扩张或者野蛮生长，恐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而且我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手段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但是在经济手段上又采用了在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更宽泛的一套治理体系或者法律体系，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结果，就使得我们在处理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以及发挥资本作用并且限制它无序扩张的时候，在政策运用和实际效果之间可能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邱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地，客观上还存在着一些限制。比如目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的群众不满情绪，其实很多都是和资本的无序扩张紧密相关，也和我们对资本行为的约束能力不足有关系。因为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的民族资本和新中国成立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资本相比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确实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接下来请孟捷老师就这个问题再进行更深入的阐述。

孟捷教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谈这个问题。第一，资本规律要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

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存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里。第二，资本规律的运作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我也不太同意刚才主持人讲的，好像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和资本是一回事，也不尽然。自从凯恩斯主义流行以后就有这么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具有两重性：国家不仅是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所以从经济思想史来讲，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代表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凯恩斯说单纯依靠私人资本主义规律的运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候社会应该接管一部分投资的权利。凯恩斯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他对马克思的论断有直接的继承性。当时马克思提出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讲资本历史正当性的问题，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占有关系实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社会形式。凯恩斯明确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关系、私人的投资权利必须实现充分就业，必须保证每个人劳动的权利。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呢？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就说明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投资权利完全掌握在私人手里，它的历史正当性出了问题，因此国家要接管你的权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凯恩斯对马克思的继承是不自觉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远远超越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设想。第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或资本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后者指的是，资本承担着为积累而积累这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凭借国家经济治理的作用，剩余价值或资本可以更充分地实现由阶级性向社会性的转化。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孟老师，接下来请周建波老师发言。

周建波教授：刚才主持人说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下资本的运行，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运行。我是这么看的，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它就一定要协调好资本的流动，一定要解决好资本的流动带来负作用的问题。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强调“均衡”，这个“均衡”往往能促进资本更长期的发展。而关于如何认识资本流动的规律这个问题，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斯密更强调资本的自由流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到了马克思，则特别强调资本

流动的负作用，包括资本流动产生了私人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还有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广大劳动者贫穷之间的矛盾。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强调国家的宏观管理。马克思之后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包括凯恩斯在内也大致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求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应对资本流动的负作用。中国的经济思想同样也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例如，从汉初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资本的正作用，转变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希望发挥儒家的“有为之学”，以文武之道的方式解决资本流动的负作用问题。

由这里带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本行为规律的认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是要发挥资本流动的积极作用，同时要竭力消除它的负作用。至于如何消除资本流动的负作用，则要看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一方面体现在国有经济力量的大小方面，这反映了国家宏观管理的硬实力，因此我们需要壮大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体现在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领导水平和消除腐败水平的高低方面，这是大规模组织管理成本高的体现，反映了国家宏观管理的软实力。如果国家宏观管理的硬实力提高了，而软实力没有提高，同样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进步造成不利的影 响。同时，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也存在一个均衡问题，即大致的比例关系问题。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不但会出现管理成本提高的问题，也会压抑民间资本的生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关于这方面的教训很多。而如果民营资本的比重过高，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够，则无力对资本流动的自发、无序进行及时、有力的宏观调控，以至出现资本的野蛮生长，从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些年就存在这方面的情况。

我还有一个观点，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的弱点，也要看到资本的无奈。熊彼特时代对资本的作用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资本运动有一个上升、繁荣、衰退、危机的周期，循环往复。而危机则更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是新的上升、繁荣周期的开始。同时，投资也确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利润。看准了市场机会的投资会成功，看不准的则肯定会失败。而一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顺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面马上会出现无数个追随者，从而导致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不断下降直至亏损。所以回到生活中，就会发现投资成功的情形并不多，反而失败的很多，这和 俗 话 讲 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是一样的。基于此，我觉得我们要用温情的态度看待资本，看待其正作用

和负作用，更多地要在怎么扬长避短和更好地发挥其正作用而抑制其负作用上下功夫。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周老师，下面请杨老师发言。

杨虎涛教授：前面老师都谈得挺多的，主持人刚才提了一个特别深刻但是也特别棘手的问题，但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主持人所说的矛盾、不平衡的问题，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特别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讨论资本不能脱离中国所有制结构去讨论，尤其是讨论关于如何约束资本、节制资本，分析了解资本的运动规律更是如此。这就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这样一种所有制的结构，包括国有资本的领域分布和规模形成以及它所承担过的和现在承担的功能究竟是怎样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的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国家主导的发展不光只是治理，国家还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发展经济，去构建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备的基础条件，尤其是工业的基础设施，打造了中国工业化的骨架，这来之不易，为我们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条件。改革开放后，我们又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将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和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成为引领和支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底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无疑更需要发挥良好的引领作用，在认识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一般性、共同性的过程中，应有统一的、平等的视角，关注资本行为后果是否有悖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在谈到把握资本运动规律，讨论设置“红绿灯”时，不能搞所有制歧视，不管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有可能存在“红绿灯”问题。因此，我们在讨论资本的行为规律时不应当具有针对性，因为这跟所有制本身没有关系。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邱海平教授：我补充说明一下。刚才我在表述自己想法的时候，更多地还是面对这几位老师，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到在线上的其他老师和同学。我最后还是想表达一个自己的看法，资本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刚才的讨论已经是从多种角度展开。当然，复杂不仅在于理论本身，也在于我们实践的发展，我们怎么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个高度，怎么能够不断去探索思考这里所存在的各种复杂的理论认识问题，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大家是否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制度是从原来过去的计划经济制度或者体制里脱胎换骨走出来的，同时我们又避免了纯粹资本主义的道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它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虽然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些困难、一些矛盾、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四史”结合的高度出发，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的问题，不能跑偏、不能偏激、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因为这是一个大课题，所以在这个认识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这些老师在内，有一些大家可能不一定赞成、不一定同意的观点、不一定同意的想法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认为无论怎么样的讨论，我们都不能偏离了中国发展这样一个伟大的道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体会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能发展成世界第二的位置，实践已经证明，这套制度、这样一条道路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我们今天经济发展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贡献智慧，如何让我们在这样一条光明的大道上继续往前走，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共同努力的总方向，不能跑偏。

孟捷教授：我也补充两点。第一，我说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治理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第二，我说凯恩斯无意识地继承了马克思，因为凯恩斯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它的历史正当性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推动技术进步为前提，凯恩斯也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提到当私人投资不能推动全社会劳动力的时候，私人投资这种权利和这种生产关系就应该被扬弃，因此要引入国家。尽管这个国家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但这也是一种资本关系的扬弃，看不到这一点，对凯恩斯是贬低，不利于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旭教授（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精彩发言。今天下午我们对“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这样一个热点话题进行了还算是比较深入的讨论。但是从讨论的内容来看，仍然是刚刚破题。因为从政治话语来说，这是我们党的文件当中首次这么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待以及各位同学怎么看待，实际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当中，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和以前每一次党代会相比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新的特点，就是每次在提出一种新的认识或者理论的概括之后，很快就会出台相应的具体实施

政策，这个间隔时间现在非常短。比如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接着出了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不像以前一种理论的提出需要三五年，再讨论个三五年，出政策再用个三五年。而从党的十九大以后，基本上一个月的周期，甚至不到一个月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实践中存在着解决的困难，理论上也存在认识的困难，但终于破了一个题，至少已经开始破题。今天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当我们无论是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东西来看待资本的历史的正当性和伟大文明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进入另一个误区，就是否定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和消亡的必然性，只是夸大它的文明作用。因为社会发展规律到了这个阶段，它就是文明的，但是它同样存在着消亡的必然性，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再有一个就是国家理论的一般化，可能也是值得讨论的。我们讲国家利益集团、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者政府的介入，是因为私人资本单独已经不能继续或者扩大剥削了，只有国家这个“总资本家”，或者大资本掌握的政府和国家的介入，才能更全面、更持久地实现资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国家从来没有缺位，只是它在位的状态不一样。这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次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也有一些理论上的分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更深入地探讨。

最后，非常感谢四位老师，还有其他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是大家一起支撑起了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学术沙龙。今天的学术沙龙到此结束，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继续关注、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再见。

（责任编辑：倪诗妆）